



发、沿河西走廊到新疆、达中亚的那条西北路线；实际上在古蜀文明以来的历史时期，中国还有一条从成都出发经云南往缅甸经东南亚、再到印度、通中西亚的“西南丝绸之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代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大夏，也就是现在阿富汗一带见到过“邛竹杖、蜀布”，其中“蜀布”就是巴蜀地区的丝绸等纺织品，由“蜀贾”从身毒国，也就是印度贩运而来。人们认为，这些特产就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输送出去的。

在1986年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研究人员在一些礼器上发现有纺织品的痕迹，据此推测当时有丝绸的存在；而本次发掘直接在出土物品上找到了丝绸纤维，这就为古蜀文明出产丝绸以及丝绸贸易的存在提供了实物证据。

同时，之前三星堆还发现了4700多枚海贝，经鉴定是印度洋沿岸地区所产的环纹贝；还有来自东南亚、云南等地的象牙。从域外输入的这些物品也反映了这条古老交流路线的存在，三星堆地区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黄金面具残片是本次发掘中引人关注热度很高的一样物品。虽然在之前三星堆有表现佩戴黄金面具的青铜人像，金沙遗址中也发现过两件黄金面具，但这次的半张黄金面具很厚重，据推测其完整体的重量应该超过500克；如果能够完整发现，这件黄金面具将成为中国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同时，这次发现的黄金面具在造型风格、使用方式上与其他已发现的古蜀时期的黄金面具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这再次证实了古蜀文明独且特色的重

视黄金的习俗。

夏商周时期早期中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对黄金并不重视，而是看重青铜礼器、玉器、大龟壳之类；直到战国秦汉时期，黄金才作为货币显现出其重要性，如楚国之“郢爰”、秦朝之“上币”、汉代之“汉金”。李竞恒说：古蜀地区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对黄金的重视，与前述南方丝绸之路带来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期的中东地区也是对黄金比较重视，例如古埃及有图坦卡蒙墓出土的黄金面具、迈锡尼出土的“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保加利亚出土有“色雷斯王的黄金面具”等。古蜀文明对黄金的看重，确实有可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受到过外部文化的影响。

当然，还有另外的可能。例如，这些习俗是来自中国范围内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例如来自北方、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的新疆

伊犁昭苏波马古墓、西藏阿里札达县曲踏墓地，乃至契丹墓葬中也都发现过黄金面具。古蜀早期几代蜀王都源出于岷江上游地区，属于和黄河上游地区文化联系比较密切的古代氏羌系，存在使用黄金面具的礼仪制度，并不太奇怪。又可能是上述两种“国内因素”与西南丝绸之路带来的“国外因素”的共同作用。

“三星堆形成使用黄金礼器这一独特地方习俗，一点也不奇怪。当时是方国联盟，王夫之、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都谈过，夏商中原王朝相当于是一个‘盟主’而已，这个盟主对于联盟中各方国的礼俗、习惯都是不干预的。”李竞恒说，《礼记·曲礼下》讲“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观念。

本次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尤其是中原式样的玉牙璋、玉琮、玉璧等，金沙也有用于占卜的大龟壳；和之前的发掘所得一样，这再度验证了古

下图：这是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5号“祭祀坑”出土的残缺的金面具。

